

臺灣學研究

Research in Taiwan Studies 半年刊 28



國立臺灣圖書館

中華民國 111 (2022)年 12 月

評介黃宣衛著《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

姜慧珍*

書名：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

作者：黃宣衛

出版單位：左岸文化/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2022 年 4 月

頁數：352 頁

一、前言



筆者和池上有地緣關係，近幾年返回池上探視長輩，充分感受到熱絡的觀光人潮為寧靜農村注入活力。翻新的池上火車站，以木構及玻璃營造「一座日光穿透的穀倉」，牆面則是居民的繪畫、書法等作品，讓遊客用藝術認識池上。

1

摘下旅遊浪漫眼鏡的「池上想像」，還能如何理解和定義「池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黃宣衛以多年在池上的田野調查和書寫，2022 年《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以「社造」切入，探究在新自主由義浪潮下，國家治理和民間動能如何接合，池上經驗是否能成為國家與市場之外的「第三條路」？

「池上地方社會的營造」為本書研究重點，嘗試以鄉鎮為單位，探索進行社造的可能性與意義。作者以專擅的社會／文化人類學訓練為基礎，涵括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等跨科際領域，從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資料之收集、分析，將位於國境邊區、產業邊陲的地方社會，迎進現代化各方結構性力量的過程，

*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碩士

¹ 旅行圖中，〈池上車站：就像是一座日光穿透的穀倉〉《遠見》，2017.05.31，檢索自 <https://www.gym.com.tw/article/38448>。

進行整體和細緻的梳理。

二、全書概要

全書共有五章及結語。第一章「池上這個地方」重點在於當今行政上的獨立的池上鄉如何發展而成。敘述 1830 年代至 1980 年代不同人群進入池上的時代背景，從親屬、政治、經濟、宗教等面向討論地方社會的樣貌。

第二章「社造與地方社會」，1990 年代後官方推動的「社造」工作，強調「由下而上」的性質，探討此階段政府政策對地方社會的影響，接著以大坡池為例，「池潭源流協進會」的現身，如何促成鄉公所將大坡池由工程轉向生態保育，隨後在池上米認證扮演重要角色。

第三章「稻米產業、無敵稻景與新自由主義」，強調池上稻農生活與稻景維護，並非單純田園牧歌式的農村生活延續，而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當地糧商與稻農跟不同時期國家政策互動的結果。尤其是新自由主義興起，面臨 WTO 市場競爭，地方人士攜手與多方力量折衝、周旋。

第四章「觀光、在地性和地方治理」，整理池上觀光產業發展的多方條件（如各級政府機構建置與政策變遷），也觀察觀光業與稻米業的磨合過程，不同階段鄉長扮演的角色與作為，也是分析重點。

第五章「以鄉為社造單位如何可能？」為作者研究池上長期命題，從日治時期疆域劃定切入，並以施添福對於「地域社會」空間型態的討論為基礎，分析在政治與經濟面向的作用下，池上如何逐漸形塑成一個有地方感的地方社會。此外，漢人宗教形成另一層民間社會地方感，進而影響日後 1990 年代的社造工程，以「池上鄉」為社造單位的範圍漸趨清晰。

結語「想望『地方』的未來」，包含三個重點：重新定義「地方」、池上經驗可以複製嗎，以及想望地方未來發展。

本書提出將「社區營造」地理尺度擴大至「地方社會營造」，跳開傳統人類學村落研究，強調日治時期以來，鄉鎮便是臺灣地方行政體系的重要單位，鄉鎮不但具有法人地位，也有固定的人力編制與經費來源，非常適合以之切入討論社造方面的議題。作者引用萊特（Erik Olin Wright）《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關於美滿人生的論點，認為池上鄉近幾年來的發展大體符合「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裡，所有人都擁有大致平等的管道可以取得享有美滿人生所需的物質與社會工具。」透過「鄉公所」層級的地方政府在公共性上的堅持，發展出再分配的政治施為，試圖緩和自由主義對地方所帶來的衝擊，「遏止邊緣化

與經濟不平等的惡化」。

三、特色與討論

從黃宣衛研究脈絡來看，自 1980 年代即在東臺灣的阿美族社會進行研究，1997 年曾以池上的大坡村為調查地點，與成功鎮的宜灣村進行比較，重點是阿美族社會文化的地域性差異。2000 年參與《池上鄉志》編纂，2010 年至 2013 年執行國科會計畫時，試圖以池上鄉為研究範圍，以族群文化進行區域研究，陸續發表調查報告與研究論文。2016 年後，他將池上作為田野重點，並從 1990 年代後對池上發展抽出具有關鍵影響的人物，撰成《共築蓬萊新樂園：一群池上人的故事》，於 2018 年出版。本書即以 2018 年的著作為基礎，進一步蒐集資料而寫成，但不論就歷史縱深、資料內容，還是論述方式，各方面都有很大差異。

筆者認為，本書或可視為 2001 年出版《池上鄉志》之延續，銜接其後二十年池上重要事件，簡要卻深掘池上地方社會變動的觀察。而《共築蓬萊新樂園：一群池上人的故事》則適切輔助讀者理解地方人物細膩的互動關係，該書引用相當豐富的訪談口述稿，立體勾繪出人物性格語調，反映報導人與當時社會情境。

本書之學術貢獻和特色，可由以下面向探討：

（一）人類學社會誌下的社造觀察

黃宣衛將本書定位在補足臺灣過往社造研究缺乏與先前地方社會研究成果對話的缺憾，更嘗試以鄉鎮為單位，探索進行社造研究的可能性與意義。運用人類學者說故事的筆調，引領讀者走進池上百年的軌跡，從有人類定居開始，不同族群遷入池上的時間、分佈，國家力量進入池上的治理過程，土地開發與利用，宗教信仰等，搭配清領、日治至國民政府等時期的地圖，以及人口、產業等統計表格，呈顯池上社會形成的動態。

由社會誌著手，得以掌握地方整體性發展，和社造如何可能。

在池上這個開發相對較晚的移民社會，我們看到人群藉由早期共同抵禦外部族群而有共同體的概念，發展到以漢人為主的社會，主要透過親屬、宗教，特別是祭祀圈和二次地方建醮，形成地理界線模糊的池上地方，而大坡池生態發展、電線桿事件和無敵稻景一連串的議題，逐漸發展出以大坡池和車站市街

附近為主體的「池上」，直至池上米認證由鄉公所接手以及後續進行的福利政策，確立以行政區鄉界為池上的「地方」。

（二）國家、經濟、公民社會互動下的社會實踐

「民間動能如何與國家力量接合」是本書主要命題，其背後更為核心的關懷是，在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為全球帶來社會不平等、自然資源掠奪等越來越嚴苛的生活環境，「人」究竟該如何因應？在批判之外，研究者是否能積極提出國家與市場之外的「第三條路」？

當中央主政者試圖擺脫社會福利的再分配角色，認為這些風險應該是由個人或家庭承擔，池上的例子反而是透過地方政府在公共性上的堅持，發展出再分配的政治施為，試圖緩和自由主義對地方所帶來的衝擊。

作者引用萊特在《真實的烏托邦》提出另類發展的社會實踐有三種模式：第一個是公民社會透過國家影響經濟行為，第二是公民社會透過資本家或企業組織的經濟力影響經濟行動，第三是公民社會直接參與並控制經濟活動。可見在資本主義另類社會經濟組織發展的過程中，公民社會扮演推動社會實踐之角色相當重要。

作者列舉東臺灣目前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參與推展的案例，例如：「花東地區產業六級化發展輔導」，在花蓮南區輔導四個合作社，以符合環境、經濟與社會永續的精神，尋覓出異於資本主義的可能。水利署第九河川局「鯨溪流域管理平台」，則是朝著政府與民間共同治理的方向，由過去重視修築堤防和聯合排水系統轉向。

黃宣衛強調，池上民間動能有一部分來自於漢人傳統社會「共好、共善」的因子，而這正呼應日本學者柄谷行人提出全人類未來的視野：我們要能與抱持不同共通感覺的「他者」取得共識，包括死者與未來的人類。不是為了重建國家共同體而建構的，看重的是全人類「最終」會基於自由和共同情感實現普世共同體。

立基於此再回頭審視臺灣社造「由下而上」社區行動、政策方針有越來越經濟導向的疑慮，至今轉型為「地方創生」，過程中雖有不少值得改進的缺陷，其核心精神依舊以地方自身狀況，擬定未來發展方向，政府並鼓勵企業協助地方發展，這些都意味著，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係必須做適當調整，池上正是可供參照和討論的案例。

（三）再論《成為池上》

此外，關於《成為池上》的論述，本文亦提供幾個討論空間：

1. 多元地方感之間的重合如何可能

本書認同黃應貴點出新自由主義化以來，地方社會呈現「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會群性與社會想像」現象。筆者感興趣的是：池上民間動能為什麼能展現越來越高度的共識和凝聚力？儘管黃宣衛認為 1990 年代社教站和救國團的活動可視為社造暖身—從「人」的營造開始，而非「物」的營造，然而核心推動人物以公務員、教師為主，我們無法清晰理解不同社群間究竟如何產生連結。

池上農業的特殊性在於幾乎以稻作為主，和其他鄉鎮多元作物不同，而池上的二次移民性質，也缺少傳統漢人社會大家族的親屬網絡，早期農務需要的換工，自然強化農民間複雜的人際網絡。

劉亮佑的研究則提供較為深入的觀察路徑，²地理標章的認證是「地方政府、農會、糧商、地方社團、農民聯手打造的地方制度及運作過程」。在農民訪談中，可看出教育訓練引進的知識體系，以及「國內良質米運動建構下的稻米品質分級概念」、農糧署「稻米產銷專區」的契作收購這些來自外部力量的制約，顯示地方主流體制抓力的強度，進而形塑「上進、責任、團結、榮譽感」的「池上農民情操」。

因此，攸關在地環境議題浮現時，一旦扣連農事、稻作利益等切身關係，農民、糧商、農會之間的連帶感，產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力量，也就不難理解電線桿事件、池上米地理認識、秋收藝術季、新開園老田區文化景觀，圍繞著水稻田的事件，儘管不同社群賦予不同的概念和意義，傳統農事生產的人際紐帶，起了不可小覷的作用。

2. 烏托邦社會圖像是否只是想像

「池上米地理標章」的誕生是由地方產業對抗 WTO 全球貿易市場競爭下的產物，對於糧商和稻農代表務實和理性的經濟收益，在鄉公所制訂的收購標準或說「規訓」下，賦予「品質」保證，透過福利政策再分配，這張地理標章更形塑池上作為品牌和商品的形象。同時，伯朗大道、天堂路、老田區文化景

² 劉亮佑，〈自由的兩難：臺東池上慣行與有機稻作的交織政治〉（新竹：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碩士論文，2017）。

觀等商業包裝、觀光行銷、文化定義，以及秋收藝術節在稻田景觀形塑布爾喬亞式的優雅氛圍。如今，池上米所連結的意象，超越米食和農業文化的基底，形成不同人群各自想像，相互疊加和渲染之後，構建一幅米鄉靜好、豐饒、共好的社會想像。

筆者曾直率向作者提問：池上真有這麼好嗎？並非筆者質疑池上社會營造的過程與成果，若「多重地方認同」是我們理解當代社會的途徑，我們該如何在多重之外的分歧取得理解和互信，面對其產生的新問題？在本書記述的重大事件，作者大多略為帶過不同人群間的對立和矛盾。報導人的選擇偏向正面表述，也如同一位報導人說的：這個小地方，如果你比較活躍，這個團體要你參加，那個團體也要你參加。(P.143) 意即，所謂的民間力量，集中在救國團、社教站和池潭源流協進會的核心人物，他們多是地方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其觀點如何能呈現整體的地方社會？

黃宣衛在稍早發表的一篇論文提到，³回顧整個池上米產地認證的過程，就表面效益看來成功地拉抬了池上當地的米穀收購價格，但它並未從結構上改變糧商與農民在米穀收益上的分配結構，反而由新的論述方式來督促農民「成為一個對自身負責的主體」。再者，耕地位於行政區界外的稻穀收購價每百台斤硬是少了 200 至 300 元，位於池上行政區內的土地租賃價格也有不小的漲幅，有逐漸形成「壟斷地租」的態勢。

劉亮佑的農民訪談中，則點出契作收購為了符合經濟效益，農民擴大耕地面積，購買農機具降人力勞動負擔，卻陷入背負大筆貸款的「機械貧窮」迴圈。這些田野觀察，反映農村社會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兩難，農民在限制和保障之間試圖尋求平衡。劉文亦揭露部分核心人士透過選舉向鄉長施壓，或者運用鄉民代表會及農會選舉，選舉的民主機制在此處成為技巧性取得地理標章爭議的主導權。筆者認為，被隱藏在書中未明確描述的紛擾，雖不至影響本書命題的探究和論述，難免阻礙讀者及未來研究者在釐清池上地方社會從既有農村結構轉型至「區域再結構與文化再創造」的路徑全貌。

對於上述筆者「池上有那麼好嗎？」的尖銳提問，黃宣衛談及作為人類學研究的初心：我們不該一味地點出問題和批評，而是不斷在探問中找到讓臺灣和這個世界更好的途徑，實現理想社會的夢想。而這個論述，作者已在書裡仔細剖析投身於社會創新和社會實踐的長久關懷。

³ 王乃雯、黃宣衛，〈新治理性下的再分配政治：池上稻米產業轉型的例子〉《臺灣人類學刊》，17.2 (2019)：85-132。

在新自由主義極致發展的潮流下、國家、市場與公民社會這三方力量，是三位一體或複雜難解的三角關係，我們不可忽略三者的根本都是「人」，人才是構成和主導的根本。在「地方創生」更為強調地方自主性的產業與商業模式，以及後疫情時代重新面對的全球經濟課題，本書對於實踐者和臺灣社會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義。